

青铜觶铭文研究 *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关键词】青铜觶;铭文;时代性;族属;族群迁移

【摘要】本文在系统收集青铜觶铭文材料的基础上,归纳出青铜觶铭文的自身特点,并利用这些特点,探讨相应铜觶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族群及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族群迁移等问题。本文的研究不限于铭文本身,希望通过分析铜觶上的铭文现象,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思路。

DOI:10.13635/j.cnki.wwcq.2015.03.002

铭文是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其记述的内容往往是我们研究历史事件、礼仪制度等的重要材料。同时,铭文可以帮助我们为铜器断代,确定铜器族属以及探讨相关族群及族群的迁移等问题。本文主要从青铜觶的铭文材料入手,在系统收集铜觶铭文材料的基础上,归纳其铭文的自身特点,并且利用这些特点,探讨相应铜觶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族群及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族群迁移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利用铜器铭文解决考古学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青铜觶铭文的内容

青铜觶虽然体量不大,但现存仍有近半数的器物^[1]上铸有铭文。其铭文内容分述如下:

1. 日名、族徽者

日名、族徽是青铜觶铭文中很常见的一类,其中有的仅有日名或族徽,有的两者同时存在,兹列举如下。

(1) 仅铸日名者

仅铸日名的出土材料有:“父戊”(张家坡 M106:7)、“父癸”(长安孙家岩)、“父乙”(山东长清县南 3 号)、“父己”(1960 年岐山 M8)、“辛”(灵石旌介 M3:9)。

传世材料有:“癸”(日本泉屋博古馆)、“祖丁”(清宫旧藏)、“祖辛”(台北故宫博物院)、“祖戊”(刘体智、容庚旧藏)、“文祖丙”(陈承裘旧藏)、“父辛”(1995 年富士比拍卖行)、“父甲”(苏州博物馆)、“父丁”(钱坫旧藏)、“父庚”(故宫博物院)、“父乙宝”(故宫博物院)、“母戊”(刘体智旧藏)、“丁母”(清宫旧

* 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 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子课题——“青铜觶研究”阶段成果

藏)等^[2]。总体数量不是很多。

(2) 仅铸族徽者

仅铸族徽的数量相对较多。

单一族徽的出土材料有：“妇好解”（小屯 M5：783）^[3]、“羊”（郭庄北 M6：2）、“戈”（郭家庄东南 M1：25）、“围”（侯家庄西北岗 M1768）、“亚丑”（1936 年青州苏埠屯）、“融”（苏埠屯 M8：9）、“鼎”（山东长清 15 号）、“亚址”（郭家庄西 M160：126）、“𠄎”（灵石旌介 M1：9）、“马”（张家坡 M28：3）、“京”（1977 年济阳刘台子）、“中”（宝鸡戴家湾）、“子”（戚家庄东 M269：78）、“息”（罗山后李 M44：9）、“盍”（鹿邑太清宫 M1：143）、“长”（鹿邑太清宫 M1：15）、“史”（前掌大 M11：58）、“庐”（前掌大 M120：20）、“子”（随州羊子山 M4）、“夆”（济阳刘台子 M6：11）。传世材料有：“妇嫡”（美国麦克阿尔平氏藏）、“山妇”（故宫博物院）、“父妇”（旅顺博物馆）、“冰妇”（1971 年富士比拍卖行）、“藿母”（荣厚旧藏）、“鹑”（2008 年澳门崇源国际春拍）、“鸟”（瑞士玫茵堂）、“光”（德国陶德曼）、“羞”（日本东马三郎氏）、“鸣”（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受”（清宫旧藏）、“簠”（美国米里阿波里斯博物馆）、“奔”（孙壮旧藏）、“发”（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畚”（上海博物馆）、“叟”（广州博物馆）、“旅”（1995 年富士比拍卖行）、“五”（图像集成 10086）、“夔”（中国国家博物馆）、“罍”（台北故宫博物院）、“櫛”（纽约贝克曼氏藏）、“𠄎”（台北故宫博物院）、“冥”（日本出光美术馆）、“万”（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爻”（台北故宫博物院）、“巫”（陈介祺、罗振玉旧藏）、“支”（美国戴维氏藏）、“亚龟”（故宫博物院）、“亚蹏”（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亚猷”（南阳市博物馆）。

复合族徽的出土材料有：“马危”（大司空 M303：184）、“庚豕”（82 小屯 M1：26）、“旒宁女”（苍山东高尧）、“羊□□”（正定新城

铺）、“冉贯”（宝鸡竹园村 BZM13：5）、“羊册”（扶风庄白 76FZH1：72）。传世材料有：“子弓”（台北故宫博物院）、“虫乙”（西安大白杨废品库）、“天豕”（1993 年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子龙（龔汝子）”（美国卢芹斋）、“亚鼎”（善斋）、“亚微”（王辰旧藏）、“叔龜”（桓台县博物馆）、“虜册”（德国林登博物馆）、“𠄎罍”（1981 年北京文物队拣选）、“北单”（刘体智、于省吾旧藏）、“𠄎舟”（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告田”（端方旧藏）、“钺簠”（英国 Ingham 氏藏）、“大丐”（刘体智旧藏）、“爰蚺”（1945 年富士比拍卖行）、“冉斂”（容庚旧藏）、“史农”（罗振玉旧藏）、“彘羊”（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弓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妇亚弼”（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制册享”（香港赵不波藏）、“西单𠄎”（纽约杜克氏藏）、“妇嫫虜册”（刘喜海旧藏）等。复合族徽中出土材料数量较少，主要为传世材料。

(3) 日名、族徽同时并存者

日名、族徽同时存在的铜解数量最多。出土材料有：“邑祖辛，父辛，云”（小屯西地 GM874：8）、“冰小集母乙”（大司空村 M53）、“父父己”（1958 年大司空村）、“母戊翌凤”（安阳高家楼 M1：4）、“守父己”（安阳大司空村 0980）、“子钺乙”（刘家庄村北 M1：20）、“罍父癸”（刘家庄村北 M9：36）、“辰卫父己”〔安阳郊区（新博 0171）〕、“己父毛（或释玉）”（正定新城铺）、“羊父丁”（张家坡 M2：6）、“冉父己”（鹤壁庞村）、“馭父癸”（殷墟西区 77AGM793：9）、“交父辛”（洛阳唐城花园 C3M417：25）、“𠄎父辛”（潍坊博物馆后邓 M1：3）、“冉癸”（宝鸡竹园沟 M13：5）、“史乙”（前掌大 M30：11）、“饮祖己”（洛阳东车站 M567：15）、“榭父癸”（灵台白草坡 M1：6）、“榭父辛”〔陇县韦家庄（陇韦 4）〕、“𠄎父癸”（灵台白草坡 M1：21）、“子父癸”

(随县羊子山)、“覃父癸”(彭县竹瓦街)、“牧正父己”(彭县竹瓦街)、“亚昊父乙”(顺义牛栏山)、“戈父己”(泾阳高家堡 91SJGM4 : 11)、“保父丁”(泾阳高家堡 91SJGM4 : 12)、“鱼父癸”(岐山礼村)、“鸟父辛”(麟游后坪村)、“亚父丁”(前掌大 M21 : 3)、“亚昊父(癸)”(滕州庄里西 M4 : 3)、“蚩父丁”(张家坡 M2 : 6)、“高父己”(四川彭县竹瓦街)、“𠄎父乙”(黄陂鲁台山 M28 : 6)、“𠄎父乙”(随州叶家山 M27 : 11)、“𠄎父乙”(宝鸡纸坊头 M1 : 14)、“𠄎父乙”(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史妣庚”(宝鸡嘴头 BSM1 : 2)、“𠄎保羽鸟母丁”(前掌大 M38 : 60)、“母此”(1972年周至解家沟)、“析父丁册”(大河口 M1 : 252)。

传世材料有：“冉丁”(吴云旧藏)、“冉戊”(故宫博物院)、“戈辛”(故宫博物院)、“子癸壘”(刘体智旧藏)、“齿兄丁”(罗振玉旧藏)、“兄丁奩”(博古 6.21)、“兄(祝)父己”(综览·觶 67)、“封祖乙”(罗振玉旧藏)、“史祖乙”(罗振玉旧藏)、“子祖己”(刘体智旧藏)、“子祖丁”(2000年富士比拍卖行)、“刀祖癸”(梁上椿旧藏)、“牧父己”(台北故宫博物院)、“𠄎父乙”(范季融藏)、“𠄎父乙”(上海博物馆)、“𠄎父丁”(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𠄎父丁”(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𠄎父丁”(吴宜常旧藏)、“子父己”(广州市博物馆)、“𠄎父己”(庐江李氏旧藏)、“木父己”(东平荣氏旧藏)、“𠄎父己”(刘体智旧藏)、“𠄎父己”(台北故宫博物院)、“子父庚”(陈介祺旧藏)、“竟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戈父辛”(博古 16.11)、“𠄎父辛”(刘体智旧藏)、“𠄎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𠄎父辛”(上海博物馆)、“𠄎父癸”(王辰旧藏)、“𠄎父癸”(滕州市博物馆)、“重父癸”(罗振玉旧藏)、“𠄎(妣)父癸”(庐江李氏旧藏)、“𠄎(妣)父庚”(丁麟年旧藏)、“冉父甲”(善斋 5.65)、“冉父丁”(1985年富士比拍卖行)、“万父甲”(普林斯顿大学

美术博物馆)、“𠄎父甲”(中国国家博物馆、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天父乙”(宝鸡斗鸡台)、“翌父乙”(中华青铜器网、图像集成 10405)、“𠄎父乙”(刘体智旧藏)、“𠄎父乙”(刘体智旧藏)、“辰父乙”(韩姆林寄陈柏弗罗科学博物馆)、“遽父乙”(罗振玉旧藏)、“父乙𠄎”(1970年富士比拍卖行)、“𠄎父丙”(图像集成 10424)、“戈父丙”(上海博物馆)、“𠄎父丙”(1941年富士比拍卖行)、“𠄎父丁”(罗振玉旧藏)、“𠄎父丁”(图像集成 10438)、“𠄎父戊”(善斋 5.70)、“𠄎父己”(中国国家博物馆)、“𠄎父癸”(刘体智旧藏)、“𠄎父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高父己”(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𠄎父辛”(吴云旧藏)、“𠄎父辛”(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𠄎父辛”(陈介祺、刘体智旧藏)、“𠄎父辛”(罗振玉旧藏)、“弓父癸”(刘体智旧藏)、“𠄎父癸”(台北故宫博物院)、“亚大父乙”(孙壮旧藏)、“亚天父癸”(1969年富士比拍卖行)、“亚若父己”(故宫博物院)、“亚昊父乙”(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亚𠄎父乙”(综览·觶 107)、“亚𠄎父辛”(曹秋舫、潘季玉旧藏)、“西单父乙”(故宫博物院)、“𠄎冉父乙”(徐同柏旧藏)、“子钺父辛”(上海博物馆)、“子𠄎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齐豕父癸”(清宫旧藏)、“何父癸癸”(故宫博物院)、“亚卯祖辛”(罗振玉旧藏)、“尹舟父甲”(伦敦富士比拍卖行)、“天𠄎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天𠄎父己”(吴云旧藏)、“𠄎大父乙”(潘祖荫旧藏)、“尹舟父丙”(美国费城宾省大学博物馆)、“遽徙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𠄎宁册父丁”(台北故宫博物院)、“母朱戈”(李泰棻旧藏)、“𠄎母乙”(西安大白杨废品库)、“𠄎母戊”(台北故宫博物院)、“𠄎母父丁”(伦敦大英博物馆)、“昊侯亚昊妣辛”(美国纽约魏格氏藏)、“父己,年𠄎,母壬,日壬”(西雅图美术博物馆)等。

从整体数量上看,日名、族徽并存的铜解数量最多,其次为仅铸族徽的铜解,相对较少的为仅铸日名的铜解。

2. 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

自名体铭文的一种,数量相对较少,且多是记作器或为他人作器的几字简单铭文。已发现一定数量,传世材料相对较多。列举如下:

出土资料有:“伯作彝”(灵台白草坡 M2:6)、“作封从彝”(青州苏埠屯)、“交伯作宝彝”(宝鸡竹园沟 BZM4:3)、“祖南翟作宝”(随州叶家山 M27:10)、“叔作新邑旅彝”(曲村 M6214:50)、“邑作宝尊彝”(洛阳北窑庞家沟 M1:5)、“伯彘作饮壶”(扶风庄白)、“伯彘作旅彝”(扶风庄白)、“史鬻作父癸尊彝”(滕州庄里西 M7:9)、“鞮作父乙彝 虜册”(宝鸡竹园沟 M7:9)、“其史作祖己宝尊彝”(北京琉璃河 M253:3)、“莽卣作父己宝”(洛阳北窑 M418:26)、“鬲卣进作父辛卣 卣”(长安花园村 M17:38)、“应事作父乙宝”(平顶山 M229:4)、“小臣作父乙宝彝”(湖北江陵万城)。

传世材料有:“应公解”(综览·解 102)、“夬作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作父庚”(上海博物馆)、“作姑彝”(罗振玉旧藏)、“作宝尊彝”(伦敦大英博物馆)、“员作旅彝”(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季作旅彝”(清宫旧藏)、“冉作父己”(旅顺博物馆)、“姑巨母作宝”(旅顺博物馆)、“矢王作宝彝”(上海博物馆)、“丞仲作旅彝”(图像集成 10589)、“徙作祖丁,齿”(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高作父乙彝”(台北故宫博物院)、“事作小旅彝”(清宫旧藏)、“伯旃作宝尊彝”(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耳对作御父辛”(刘鹗、罗振玉旧藏)、“祝儿作宝尊彝”(广州博物馆)、“彭妇作彝,父辛”(图像集成 10611)、“攸作父癸彝,舟”(旅顺博物馆)、“朕作父癸尊彝”(上海博物

馆)、“疑作宝尊彝,卣”(故宫博物院)、“丿作父丙宝尊彝”(容庚旧藏)、“子达作兄日辛彝”(端方旧藏)、“伯作厥祖宝尊彝”(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中作妣己彝,亚址”(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太史作宗彝,濂季”(陕西耀县)、“鬻彝夔作祖辛彝”(曹秋舫旧藏)、“作父戊彝,亚显册”(上海博物馆)、“凡作父乙尊彝,玆”(博古 6.8)、“亚及,谏作父乙尊彝”(博古 6.25)、“遽仲作父丁宝,亚彘”(上海博物馆)、“舌仲作父丁宝尊彝”(伦敦大英博物馆)、“鼓辜作父辛宝尊彝”(周鸿孙旧藏)、“齐史疑作祖辛宝尊彝”(故宫博物院)、“季作父癸宝尊彝,用”(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何作卣日辛宝尊彝,亚得”(博古 16.14)、“夔肇贾,用作父乙宝尊彝,虜册”(美国鲁本斯氏藏)、“伯作饮罐”(图像集成 10855)、“义楚之祭卣”(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以上有为其父作器的,如花园村 M17:38鬲卣解和平顶山 M229:4 应事解,也有自作器的,如竹园沟 BZM4:3 交伯解。以上两类都有明确的作器者,作器对象亦很明确。但仍有作器者从略、作器者和作器对象不明者,如青州苏埠屯所出作封从解。

3. 记录某事件者

属记事体铭文,数量极少,一般记录受赏、册命或某个历史事件。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主要有 3 件,传世材料有 8 件,列举如下:

“乙丑,厝易贝于公仲,用作宝尊彝。”(琉璃河 M251:9)

“乙丑,公仲易庶贝十朋,庶用作宝尊彝。”(琉璃河 M251:8)

“唯伯初令于宗周,史鬻易马匹,用作父癸宝尊彝。”(滕州庄里西 M7,范季融《首阳吉金》)

“王后取克商,在成师,周公易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上海博物馆)

“公赏束,用作父辛于彝。”(瑞典斯德哥

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

“北子作宝尊彝,其万年,孙予子永宝。”
(清宫旧藏,盖藏故宫博物院)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吕,王易中马,自隳侯四马,南宫祝,王曰:用先,中虬王休,用作父乙宝尊彝。”(湖北安州,博古 6.30)

“曷仲作侂生饮壶,勾三寿懿德万年。”
(上海博物馆)

“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各太室,咸并叔入右,王乎内史册令,更厥祖考服,易,赳,戠衣,缙市,回衡,旂。赳拜稽首,扬王休,对,赳蔑历,用作宝尊彝,奉世孙子毋敢墜,永保,唯王二祀。”(上海博物馆)

“徐王祐又尚,尚漑之焯。”(台北故宫博物院)

“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尚,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台身,子孙宝。”(台北故宫博物院)

徐王觶和徐王义楚觶为春秋晚期的复古作品,所以形制虽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圆口细体觶接近,但铭文的附着方式和文体都与其他铜觶不类。

二、青铜觶铭文的特点

通过前文的罗列,我们注意到,青铜觶上的铭文有着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点:

1. 字数少,以日名、族徽为主,特征明显。

青铜觶上的铭文,可能受限于载体体量较小的缘故,字数普遍较少,5字及以下的铭文占到90%以上,即便记述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也多是5字左右的简单文字。9字以上的记受赏、册命或者历史事件的有器形可证的铜觶仅11件,其中还包括2件为春秋晚期的复古作品,而这些字数相对较长的铭文,无一例外都铸在粗体觶上(2件复古的春秋晚期觶不在讨论之列)。可见铜觶上铭文字数

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其体量较小,难有空间铸较多的文字。到西周时期,青铜觶器体相对矮胖,才有可能附着较多的文字,如已知铭文字数最多的趯觶,完整地记述了趯接受册命的整个过程,铭文达到69字,而其器形已相当矮胖,形制为粗体觶的最后形态,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尊”。所以铜觶在西周时期铭文字数仍不多的原因,并非铜觶在铜器中地位不高之故,概因其体量相对较小。此外,另一个原因是相当一部分的铜觶时代处在商代晚期,进入西周后较多地延续了商的传统,铭文依然以日名、族徽为主。这也揭示了青铜觶铭文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日名、族徽现象。

青铜觶上的铭文以日名、族徽为主,可以说是其铭文的最大特征。仅有日名、族徽的铜觶就占到有铭铜觶总数的70%左右,而前文所举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一类中,基本都涉及日名,多数涉及族徽。如将这些加在一起,铜觶上有日名、族徽的数量远超过有铭铜觶总数的90%。而不涉及日名者,基本为自作器、作尊彝或宗彝、作旅彝或作某类器四类,如“应公觶”(综览·觶 102)、“伯作彝”(灵台白草坡 M2:6)、“邑作宝尊彝”(洛阳北窑庞家沟 M1:5)、“太史作宗彝,濂季”(陕西耀县)、“叔作新邑旅彝”(曲村 M6214:50)、“伯作饮罐”(图像集成 10855)均不涉及其他作器对象。凡涉及除自己以外的特定作器对象者,均有日名。这些日名铜觶的作器对象,有祖辈的“祖”“妣”,也有嫡系一支的“父”“母”,基本涉及到铜器铭文中的所有纪念对象。而这其中,又以为“父”作器者的数量占据绝大多数(这一项的数量是其他三项总和的好几倍),可见在商周时期“父”为铜器的主要作器纪念对象,亦应是祭祀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商周祭祖礼中,主要祭祀对象可能就是祭祀其嫡系一支的“父”。虽然在商代晚期有着“周祭”制度,但是“父”才是主要的祭祀对象和

最普遍的现象,也体现了此时对于“父”的尊崇,以及父权在礼制和社会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当然,从铭文中日名最多的现象也可以看出,日名制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恭王以前)的重要礼制习俗,是从商代延续至西周前期的一种社会传统。

除了日名,族徽为青铜解铭文的另一大宗,数量仅略次于日名者。在这些族徽中,有单一族徽者,也有复合族徽者,其中以单一族徽为主,如“冉”“戈”“夂”“龔”等。复合族徽中,有的是两种族徽的复合,如“子钺”“戲龔”“虜册”等,也有多种族徽的复合,如“虜宁册”“剌册享”“妇龔虜册”等。而无论单一族徽,还是复合族徽,均有加“亚”形者,如“亚典”“亚屈册”“冥侯亚矣”等。多数情况下,单一族徽在“亚”形内,甚至有的将日名也都置于其中,如“亚卯祖辛”。但是复合族徽中,有的族徽全部在“亚”形内,有的只有某一个或几个在其内,而另一个在其外,如“亚矣**”,有的“矣”在“亚”形内,有的却在其外,情况十分复杂。总之,铜解族徽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周时期族徽铭文的复杂性。

2. 史料价值高

青铜解上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却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这首先体现在记述历史事件的文字中。小臣单解铭:“王后取克商……”,记周王朝二次克商之事,即周公平定武庚和“三监之乱”的史实,为成王时期之标准器。滕州庄里西 M7 出土的史鬻鼎铭“唯伯初令于宗周,史鬻易马匹,用作父癸宝尊彝”,类似的铜器铭文体例有匱侯旨鼎的“匱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等,一般均指各封国在首封之后的各代诸侯即位后,至宗周觐见周王获取周王认可之事。因此该器虽只有 18 字,但由于出土自滕国墓地,所以结合该器的时代,可认为其记述了周初分封于滕州庄里西一带的滕国第二代滕侯即位后第一次觐见周

王,受命于周王的史实。同时,该铭也进一步说明了西周时期分封制中央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各诸侯虽亦为嫡长子继承制,但只有得到周王的承认和“受命”才能真正取得侯位,中央王朝对于即位诸侯的人选有着相当的决定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周分封制下,周王朝对于诸侯国的控制力和统治模式。中解作为北宋重和元年(1118)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记中受赏于周王之事,内容涉及“南宫”。而同为“安州六器”的中鬲铭文又涉及曾国。近年叶家山墓地讨论的焦点即为曾国的族属问题,新出犹簋记曾侯烈祖为“南公”,而发掘者认为此“南公”之“南”即为文献和金文中“南宫”的省称,从而推定叶家山一带的曾国应为姬姓^[4]。而中解铭文因涉及“南宫”,其必将是日后学界讨论曾国与南宫氏关系时不断提及的材料。

此外,青铜解铭文涉及的西周封国,记有应国(应公解)、史国^[5](史解)、逢国(逢解)、齐国(齐史疑解)、邶国(北子解)、宋国(长解)等,其为研究西周早期的封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同时,铜解铭文也体现了使用者的社会等级。从铭文看,使用铜解等级最高的在商代晚期是商王的配偶,如妇好解,西周前期为诸侯,如应公解,至今没有发现商王或周王的有铭铜解,或与商王陵被盗、周王陵未曾发现有关,但能使用铜解者显然都是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而趯解铭文记述了一段完整的册命过程,对于了解西周的册命制度亦有意义。

三、青铜解铭文体现的族群及族群的迁移

青铜解上的族徽除史料价值外,还揭示了存在于商周时期的部分族群及其发展、迁徙的过程。

关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虽有从事美

术史研究的学者对其性质提出过异议,但是多数学者相信这些铭文就是郭沫若先生早在1930年就指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子遗”的说法^⑥。作为研究商周时期族群的重要依据,青铜器上的族徽代表了生活在此时期的族群。而这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铜解为我们讨论族群的生活区域以及迁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如商代晚期基本都出土于殷墟的族徽有“羊”(郭庄北 M6:2)、“戈”(郭家庄东南 M1:25)、“子”(戚家庄东 M269:78)、“围”(侯家庄西北岗 M1768)、“亚址”(郭家庄西 M160:126)、“庚豕”(82 小屯 M1:26)、“守父己”(安阳大司空村 0980)、“子钺乙”(刘家庄村北 M1:20)、“鬲父癸”(刘家庄村北 M9:36)、“辰卫父己”[安阳郊区(新博 0171)]、“母戊翌凤”(安阳高家楼 M1:4)、“*小集母乙”(大司空村 M53) 这些无疑都是生活在殷墟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他们与商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息”族铜器集中出土在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河南罗山县天湖村墓地,由于近年荥阳小胡村和正阳润楼两处族墓地的发现,可确指此时商王朝的南界就在信阳罗山一带^⑦,因此“息”(罗山后李 M44:9)族也应是殷人族群之一。而在商代晚期,商王朝在西方、北方、南方全面收缩的情形下,始终未放弃对于东方的控制,特别是鲁北地区。已知青州苏埠屯四条墓道大墓正是商王朝此时控制鲁北一带,掌握环渤海沿岸盐业遗存的重要据点^⑧,因此铜解上的“亚丑”(1936 年青州苏埠屯)、“𠄎~门”(潍坊博物馆后邓 M1:3)等也应是殷人集团的族群之一。

这些族群在商、周王朝更替之后的周初多被分散至王都地区以及各个封国。通过青铜解铭文可以探明的有“子”族及以其为主的复合族徽“子钺乙”族和“戈”族、“羊”族等。

“子”族铜解发现于殷墟的戚家庄东(M269:78)、“子钺乙”族铜解发现于刘家庄村北(M1:20),而进入西周后,“子”族(子、子父癸)铜解见于噩国西周早期的中心区域随州羊子山的两座墓,“子钺”与“单”复合(单子钺)的1件尊和1件卣见于琉璃河燕国墓地 M251。“戈”族铜解发现于郭家庄东南 M1,而戈父己解发现于西周成康时期的涇阳高家堡 91SJGM4,该墓地被学界公认为西周早期的“戈”族墓地。“羊”族铜解发现于郭庄北 M6,而羊父丁解发现于西周早期的张家坡 M2,与“羊”族相关的复合族徽“羊册”发现于西周中期的扶风庄白 76FZH1。这些晚商就生活在殷墟的族群,其铜器在西周时期王都以及封国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赍赠、助祭等原因,另一部分则可能是族群迁移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因为商、周王朝的交替,特别是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殷人集团被周王朝分散至各处,以分而治之。这方面的文献依据有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的记载,而早些年授予鲁国的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铜器在兖州李官的发现^⑨,更印证了这些记载。考古的证据就是这部分殷人集团墓葬甚至墓地西周早期的发现,涇阳高家堡戈族墓地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青铜解的族徽铭文还体现了周初分封殷遗民、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对于研究商周族群迁徙、商周统治政策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

四、青铜解铭文反映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

铜解铭文所反映的时代性,一是某类铭文体例所揭示的时代特征,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判断其相应物质载体的时代;二是最具特色的铜解铭文的存在时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当然,以上是两类不同形式的铭文,但二者又有着一定的关系,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分析铜解的族属以及揭示出西周礼制的

变革。

第一要分析的是前文所举的第2、3类铭文。这类铭文无论是前者的“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亦或后者的“记受赏、册命或历史事件”，从出土材料看，其时代特征都非常明确。如滕州庄里西 M7(史鬻觶)、灵台白草坡 M2(伯觶)、宝鸡竹园沟 BZM4(姜伯觶)、宝鸡竹园沟 M7(鬯觶)、随州叶家山 M27(祖南蕞觶)、北京琉璃河 M251(公仲觶)、北京琉璃河 M253(其史觶)、曲村 M6214(叔觶)、洛阳北窑庞家沟 M1(邑觶)、平顶山 M229(应事觶)、洛阳北窑 M418(莽卣觶)、长安花园村 M17(鬯鬯进觶)、扶风庄白窖藏(伯彘觶)、湖北江陵万城墓(小臣觶)都是明确的西周前期墓葬或窖藏。只有1931年出土作封从彝觶的青州苏埠屯墓需要讨论。青州苏埠屯墓地由于发现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早年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其时代为殷墟晚期，但是近年有学者指出该墓地的时代在西周时期^[10]，而我们也认为，虽然苏埠屯墓地以四条墓道大墓为代表的墓葬的时代约在殷墟四期，但是该墓地的时代可进入西周^[11]。而具体到这件铜觶，吴镇烽先生亦认为其出土的墓葬为西周墓，时代为西周早期^[12]。因此，出土材料均证明该类铭文体例的铜觶时代为西周前期。传世材料虽没有明确的出土单位，但是从其形制判断，时代与出土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只有个别形制的或可早至商周之际，但具体到某个铜觶上，其绝对时代基本都应进入了西周。

第二要分析的是前文所举日名、族徽铭文。这类铭文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以殷墟的发现为代表，这点前文已有涉及。具体讲，日名作为一种礼制和社会习俗，出现的时代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13]。族徽除商代晚期集中发现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其所代表的族群在西周前期亦随着周初的分封

迁徙到各处，因此其时代也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当然，它也揭示了附着这类铭文的铜觶的时代集中在这一时期，而这也是铜觶最主要的存在时段。

结合时代性，此类铭文还能帮助分析铜觶的族属。既然铜觶上的日名、族徽在商代晚期集中发现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特别是殷墟），而这一时期铜觶上凡有铭文者均为日名、族徽，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将铜觶的族属与殷人族群集团联系在一起。而进入西周后，铜觶上许多有据可证的族群都是从商代晚期的殷墟地区迁徙至西周王都地区及各封国的，坚持不用族徽者，是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族群。有学者早年提出“周人不用族徽说”的命题^[14]，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西周前期不用族徽的铜觶情况亦与之相近。坚持不用日名的也多为姬姓周人，如琉璃河 M251 出土的公仲觶和庶觶。该墓位于琉璃河墓地不使用腰坑、殉狗葬俗的Ⅰ区，学界公认为墓区的性质是以亶侯为代表的姬姓周人，因此该墓出土的这两件铜觶不见日名的现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周时期姬姓周人在较多地排斥日名制。因此，青铜觶的族属应主要为殷人集团，其在西周时期的使用者是以殷遗为主的族群集团，西周时期其他一些族群集团的使用主要是由于此时期铜觶在酒器核心组合中地位的提升，并且在这些族群中，姬姓周人的铜觶不用族徽，同时也较多地排斥日名制。但是日名、族徽现象的大规模消失，是以西周前、后期为界的，这在铜觶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文献中有“穆王修典”“恭王礼制改革”的记载，日名、族徽现象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变革，数量明显减少，殷遗也普遍放弃，并在西周后期基本消失。关于西周前、后期的礼制变革，有学者从铜器演变的角度进行过讨论^[15]，而日名、族徽的演变应是礼制变革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以姬姓周人为

主的统治集团对周文化因素的巩固和对商文化因素的彻底排斥,并以此来规范上层集团的礼制秩序。

五、小 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由于青铜觶体量较小的缘故,日名、族徽是其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特点从晚商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而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和记述某事件两类铭文则具断代意义,凡使用该类铭文的铜觶,其时代均已进入了西周。此外,通过铜觶的日名、族徽现象,以及主要出土在晚商时期的安阳殷墟地区的特点,使我们认识到铜觶的族属应是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由于日名、族徽是晚商时期重要的社会礼俗,即使到西周成王六年(前1037)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周王朝开始有意识地排斥殷礼、施行周礼,相应的铜器组合也发生了变化^[16],但是日名、族徽依然为殷人为主的族群集团所固守,直到“穆王修典”“恭王礼制改革”之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族徽横跨商周王朝的现象,为我们讨论商、周王朝更迭时期出现的族群迁移现象提供了证据,也为研究周王朝对殷遗集团和异族的统治政策提供了依据。总之,本文的研究不限于铭文本身,希望通过分析铜觶上的铭文现象,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思路。

[1]由于传世器的特点就是以有铭铜器居多,因此本文数字仅为大致估算。从目前出土青铜觶的数字统计,有铭铜觶所占占比率不到40%。

[2]本文的统计范围为有器形可证确为铜觶者,仅存拓片的不在收录范围。

[3]“妇好”一般理解为人名,但是书写方式、位置均与族徽相同,且意义与族徽接近,因此暂将其归入此处。

[4]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2期。

[5]曹斌:《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6]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7]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4期。

[8]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载《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9]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7期。

[10]黄川田修:《齐国始封地考——山东苏埠屯遗址的性质》,《文物春秋》2005年4期。

[11]曹斌:《周代的东土——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及其文献的整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05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3]我们采用大致以恭王为界,将西周分为前、后两期的说法。

[14]张懋镛:《周人不用族徽说》,《考古》1995年9期。

[15]a.罗森:《古代中国礼器——来自商和西周时期墓葬和窖藏的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b.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变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载《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c.罗森:《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16]曹斌:《试论青铜觶的组合和墓葬的关系》,待刊。

[责任编辑:成彩虹]